

## 壹、前言

1871年普法戰爭後，普魯士首次建立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並在《普魯士憲法》(Preußische Verfassung)基礎上，增加有關新建帝國之相關內容，而頒布《德意志帝國憲法》(Verfass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該憲法明定德意志帝國為聯邦體制國家(Deutscher Bundestag, 1918)。但與帝國興亡年代幾乎同期的Weber(1864-1920)，在1904年訪問美國時卻指出，德國各邦教育行政部門已經形成類似「卡特爾體制」(Cartel)，亦即呈現一種壟斷組織的形式，在聯邦體制下之各邦教育行政部門漸成為普魯士教育行政部門的附庸，在相當程度上，彼此間缺乏競爭關係(Weber, 1973a)；反觀另一個聯邦國家——美國的大學則呈現另一番景致：

美國大學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種彼此競爭的機構……更重要的是，這種競爭在原則上完全自由；它們以一種相當無情的方式與其同類機構競爭，並遵行種種的競爭規則，猶如現代工業企業一樣，為了效益而追求無情的競爭。(Weber, 1973a)

Weber甚至認為，美國大學具有一種「活躍的股票市場模式」(active in the stock)，此用現代話語做更具體的表達，就是一種競爭性企業型大學模式。由於私人企業競爭型態滲入美國大學體制，大學間的競爭態勢亦影響其教師的工作氛圍，而使其隨時得面臨被解僱的風險；一旦無法滿足雇主的期望與要求，經常會毫不留情地被迫離職，尤其雇主們希冀大學教授們「能招徠眾多學生」，其授課教室最好能呈現黑壓壓、萬頭鑽動的景象，更使得大學成了無情篩選教師能力、充滿競爭的場域(Weber, 1973a)。

Weber所處的時代，恰是德國學術與教育體制執世界牛耳的時期，尤其做為德意志帝國皇冠頂端的德國大學，更是各國教育制度仿效的對象，對此，Weber(1973a)亦指出，「美國各大學在本質上為漸進緩慢之『歐洲化』所型塑」。如以諾貝爾得獎人數為例，在Weber正值盛年的20世紀初期，德國的得獎人數已連續10年遙遙領先其他國家(Nobelprize.org, 2012)。即使如此，哲人具有一葉知秋、見微知著的洞察：

我不斷地問自己：「德國大學將來能與世界上偉大的力量競爭嗎？特別是能與美國人競爭嗎？」(Weber, 1973a)

Weber從宏觀的角度審視德國與美國大學的差異，他認為後者之國家管制力量較弱，大學無需滿足國家機構的需要。對此，Weber (1973a) 評述：

我深信，隨著行政改革的進展，德國大學遲早會出現與美國相似的情形。我希望，在那個時候，德國大學能像美國大學那樣，在一個比較好的氛圍中保持其獨立性。

Weber (1973b) 甚至大膽地斷言，美國大學因更能適應現代工業社會，所以會是未來大學發展的趨勢，「德國大學和德國人的日常生活一樣，會逐漸邁向美國化」。質言之，Weber一方面肯定美國大學的發展遠景，另一方面則認為德國大學將會反過來向美國的企業型大學模式靠攏。

本文主要以文件分析法並輔以學者專家之論述，探析德國公立的企業型大學之相關內容，檢證Weber的預言。在行文上，依序探究德國企業型大學的崛起、指導原則及其所引發之爭辯。

## 貳、德國企業型大學之崛起

德國「高等學校發展中心」(Centrum für Hochschulentwicklung) 首任主席 Müller-Böling (2000) 曾指出，許多德國大學已漸轉向企業型大學方向發展，並轉而將大學視為「服務型企業體」(Dienstleistungsunternehmen)，也就是強調競爭的企業型大學。可是，這種企業型大學如何在德國崛起呢？大學體制的發展，無法自外於整體社會發展的進程，反倒是其發展趨勢的一種表現形式，因此，以下從全球層面、德國層面及大學層面依序說明席捲全球的《服務業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s in Services, GATS)，而後說明德國政府部門之改革，最後再探究德國大學由組群大學 (Gruppenuniversität) 轉向企業型大學之緣由。

### 一、服務業貿易總協定

直到1990年代初期，許多人仍將大學的功能視為教育、批判、反抗權威、孕育